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4.01.006

[引用格式] 巩见刚,夏斐. 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意义研究:一个诠释学的视角[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4(1): 67-78.

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意义研究: 一个诠释学的视角

巩见刚¹, 夏斐²

(1. 大连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2. 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48)

摘要: 通过经典文学作品来讲授领导力课程是詹姆斯·马奇的一大特色。这样一个文学化马奇是马奇留给现代管理学的一笔厚重遗产。对于这样一笔遗产,学术界却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诠释学的视角出发,对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内涵及意义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文学化马奇虽然不符合主流管理学及实证主义范式标准,但是却与诠释学这样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相符合,是诠释学一脉在管理学中的延伸。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学化马奇的学术合理性。然而,文学化马奇所代表的诠释主义范式还有助于解决与实践相关的根本目的、道德判断和度的把握等问题,有助于解决主流管理学期长期存在的与实践脱节问题。

关键词: 马奇; 管理学; 文学; 诠释学; 实践智慧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4)01-0067-12

一、引言

马奇是一个特立独行而又开一时风气之先的管理学者,在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式的贡献。对于其思想,管理学界过去虽然也多有介绍和研究,但是马奇思想中的有些东西还是被忽视了。众所周知,马奇习惯并擅长通过经典文学作品来阐述自己对于管理的理解并帮助学生把握相关管理思想。因为马奇的贡献,《堂吉珂德》《战争与和平》等经典名著破天荒地被引入到商学院的课堂,成为马奇讲授领导力课程的主要材料。此外,马奇还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出版了十一部诗集,还制作了两部与领导力有关的电影,这在管理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在马奇之前,少有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通过这种方式讲授相关课程^①。在马奇之后,也少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这样一种尝试。如此一来,文学和马奇形成了一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马奇借助文学阐发自己对于管理的理解,文学则成了马奇的一个特有标签。可以说马奇作为一个管理学大师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化的。而对于

^① 至少在可见的材料范围内是如此。

收稿日期: 2023-11-20

作者简介: 巩见刚(1978-),男,山东淄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统管理哲学研究。E-mail: gjg302@sina.com

夏斐(1999-),女,山西朔州人,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研究。E-mail: xf18434666906@163.com

这样一个文学化马奇及其背后的意义,学界却少有人关注和发掘^①。因此,马奇虽然伟大,但是在管理学领域引领的“文学革命”却有些后继乏人。在主流的实证主义范式看来,马奇的文学化是一种离经叛道和对主流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给予其必要的认可和尊重。因此,马奇的这一创举极有可能就此烟消云散。基于此,本文将从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出发,论述文学化马奇何以重要以及为什么应该继承、发扬他的这一创举。结果认为,文学化马奇实际上继承了狄尔泰以来西方社会绵延不断的诠释学传统,其背后隐含了一个管理学的诠释主义范式。他在主流管理学者眼里可能是异类,却是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息息相通的。在主流管理学越来越脱离实践的今天,马奇实际上用他的哲学思考为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二、西方诠释学及其基本内在逻辑

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统治当今管理学的主流范式。对于很多研究者而言,管理学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但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应该遵循主流的实证主义范式。不如此,相关研究就很难称之为科学。即使在实证主义备受质疑的今天,学者们能够设想到的出路也只是情景化和质性研究方法。而这二者本质上仍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质性研究只是不再追求研究过程的量化而已)。这说明,实证主义的长期影响已经使得学术界对管理学可能有的学术范式失去了应有的认识和想象力,只能在实证的范围内作出一些微小的改进。实际上近百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应该遵循何种学术范式一直有所研究和探索,而且还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诠释学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集中体现。而文学化马奇恰恰契合了诠释学的传统。因此,深入理解文学化马奇的学术贡献,诠释学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诠释学的德文名称是“Hermeneutik”,英文名称是“Hermeneutics”。它是西方世界中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当时社会对神的信仰催生了对神的指示进行解读的需求,由此也就诞生了最早的诠释学。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诠释学也从原先隶属于神学、逻辑学的一个分支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直至在20世纪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扭转了二战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当然也为人文社会科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或者学术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狄尔泰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导致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流行。它们甚至开始越过自然科学的边界侵入到传统人文科学领域的领地。很多受其影响的人认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其科学性、严密性无法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应该自然科学化。由此也就导致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自然科学化。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狄尔泰开始了为人文社会科学寻求认识论基础的努力。他认为,精神科学(即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人文科学)作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要探索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并不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探究概念与外在世界相符的认识论基础。因为精神世界的对象就是作为人的精神的客观化物。因此,狄尔泰认为不是自然科学意

^① 国内管理学重在科学和概念、理论创造,自认为和文学是不相关的。因此,对于本文重视文学这样一个思路可能感到不理解,认为这脱离了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应有路径。实际上文学与领导者的理想、道德判断力及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经典文学作品在很多方面起到了正式的管理学教科书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故而马奇将文学和领导力培养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传统社会在培养作为国家、社会管理者的士大夫时,以《诗经》、唐诗和宋词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作品也是必修的课程项目。古今中外的历史说明将文学与领导力培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古已有之。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应该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

义上的客观观察和逻辑推理,而是理解和解释才应该是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1]。所谓理解就是经由外在感官所感知的符号去认识其内在思想的过程,就是“在你中重新发现我”。只有通过理解,方能把握精神的客观化物之后所蕴含着的客观而又普遍的精神,形成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关键所在。也唯有解决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至关重要的人生意义、目的和价值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狄尔泰看来,理解之所以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我和你之间在根本上有一种本质的共同性。因此,他强调人是诠释学的产物。

狄尔泰诠释学主要是在工具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展开的,重在强调对他者或者其精神的客观化物的准确理解。而后世学者在继承此种思路的同时,还从其它一些角度出发发掘了诠释学的本体论价值。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诠释学的发展方向。这表现为海德格尔继承了狄尔泰的部分思想,开始从诠释学的视角出发理解人的存在(即“此在”),从而将现象学发展为一门此在诠释学。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诠释学不再局限于狄尔泰认识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而是一种关注人的本身存在的现象学阐释。在海德格尔诠释学中,理解不仅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且还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而且,海德格尔对何谓理解有了新的发现和解释。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就是与事物打交道。因此,其最本真的方式就是在事物自身的运作中使得自身被揭示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处于一种与在者使用着的交往之中,在者身上的客观特征才会完整地表现出来。后期的海德格尔哲学更是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此在诠释学。在他后期的哲学里,某种更高的东西,可以说是无上帝名称的“全在”被凸显出来。理解和诠释学被他认为就是倾听这个最高存在的指示。同时,他也意识到语言对于诠释学的根本性。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人思考、展现自身存在的工具,还是统治我们的主人。由此语言在自身工具性退却的同时,获得了一种实体性的存有论的真理性向度。也就是说,我们在严格意义上隶属于语言。人不再是语言的主人,而是只能从语言期待“暗示”。语言由此被海德格尔认为是存在者的家。诗歌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受到海德格尔特殊的强调,因为他认为在诗歌里保留、产生了真理,而真理就创造性地保存在以诗歌、艺术品为代表的作品中。

在吸收黑格尔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将诠释学发展为一门哲学诠释学。他认为语言不仅是生活的表达方式,而且是真理的启示。因此,诠释学的任务不再是仅仅通过设身处地、移情来客观理解、再现他人思想那样简单,而是要把过去的思想融入自己的思想中,去发现、揭示所谓的真理。传统的理性主义将人既有的视角或者观点看作理解的障碍。伽达默尔则强调前见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前见也是历史实在本身和理解的条件。摒弃前见,不论这是否能够成功,实际上先意味着摒弃理解了。因为前见代表了人已有的认识视域,理解由此也就变成了人已有的认识视域与作品相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中,人进入并理解了作品,形成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生和真理的新理解。

伽达默尔还推动诠释学的一种新的转向,开始将其由一门作为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转向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它要探讨的就是那些决定人类认识和活动的关键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所以为人、人对善的选择等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和实践,而不再仅仅是理论,成了这一新的诠释学的双重任务。而这一诠释学的本质在于恢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恢复以实践智慧为核心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在对亚里士多德的 *phronesis* (实践智慧)、*episteme* (科学) 等概念进行文献回顾后,伽达默尔认为近代的科学概念并不能代替实践理性与政治合理性,而唯有实践智慧才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因此,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近代实证主义

的方法论和科学概念,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准确的模式。当我们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时,唯有恢复实践智慧的权威,以此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使之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我们才能产生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文社会科学。

总体而言,作为哲学的诠释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文社会科学之认识论以及发展路径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对以文本为代表的符号进行解释、理解,最终实现对相关真理的把握的哲学体系。它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分支:专注于方法论的诠释学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但是,无论哪一种诠释学,它一开始就与主体对文本内涵真理的社会应用联系在一起。因为有所理解必然反映到现实行动上,而且也只有应用中才会有真正的理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诠释学必然会发展为实践哲学,必然会与实践智慧联系在一起。

三、文学化马奇与管理学诠释主义范式

诠释学的哲学内涵及其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化马奇所具有的管理学价值。

如前所述,马奇常常借助经典文学作品来培养管理者的领导力,形成了与主流学院派完全不同的学术风格。马奇认为,传统理性选择的模式把领导力抽象化、理论化,单纯地强调行为的逻辑性和一致性,这对于理解实际生活中的领导力而言常常是苍白无力的。现实生活中的领导者受制于人的七情六欲及自身习惯,实际上与以概念和模型为主的领导力理性模式大相径庭。文学作品中那些内心充满矛盾、对周围环境和过去经历十分敏感的主人公更接近于实际生活的领导者,更有助于从根本上揭示领导力的内涵和机制^[2]。对于领导力的一些相关主题,马奇认为社会科学虽然有所探讨,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对其思考得更加深刻、表达得更加鲜活。他曾以诗人叶芝的诗歌《1916年复活节》为例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这首诗歌既颂扬又谴责1916年的英雄,敬佩之情和鄙夷之情难分难解,隐含的意思是:模糊、矛盾和正反感情并不是错误,不该排除在意识之外,要想明智地理解现实,就必须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每个优点都有其缺点,每个缺点都有其优点。”^[3]因此,马奇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已经超越满是管理学概念和理论的管理学教科书而成为学习领导力问题的最佳渠道。而他本人在管理学家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位出版过多部诗集杰出诗人。通过自己的诗歌,马奇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领导和管理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例如,在《雪中足迹》一诗中,马奇借用诗化的语言写出了个人的渺小,并借此引导人来理解领导者面对无穷无尽的世界时的渺小和无助。

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文学化马奇?文学化马奇显然不符合主流管理学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但是值得高度关注和进一步研究。因为他与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诠释学高度吻合,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管理学学术范式。马奇将经典文学作品与人生目的、领导力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解决与领导力密切相关的人生目的、领导目标等问题,认为文学作品中那些内心充满矛盾、对周围环境和过去经历十分敏感的主人公更接近于实际生活的领导者,更有助于揭示领导力的相关机制。而阅读各种文本符号,特别是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而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形成阅读者对人生意义、道德伦理等的理解和把握,恰恰是诠释学作为一个重要哲学流派的一贯宗旨。海德格尔强调在诗歌、艺术品里产生了真理,而真理就创造性地保存在以诗歌、艺术品为代表的作品里。另一位诠释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利科指出,“通过向我们打开的不同之物,历史向我们开放了可能性,而小说通过向我们打开不真实之物,引导我们进入到现实的那些本质东西之中”^[4]。马奇朝向文学的主张虽然与主流管理学完全不符,但却很好地

体现了海德格尔、利科所代表的诠释学传统。可以说文学化马奇就是诠释学传统在管理学领域的延伸。虽然马奇没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或者课堂上就如何诠释文学作品以及发展领导力的具体方法和技巧作过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论讨论,但是他对经典文学作品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各种实际的行动,说明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诠释经典文学作品对于许多重大人生问题及提升领导力的重要价值^①,意识到了经典文学作品和优秀诗歌不仅仅是文字和艺术的堆砌,更是凝结了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关于人生意义、人性、世界本质和道德伦理等重大问题的思考^②。在马奇看来,相对于传统的概念和理论学习方式,通过诠释、理解文学作品,学习者将会从整体上实现对人生意义、人性及世界本质等关键问题更有效的把握。而这些问题本来就与领导力纠缠在一起。因为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相当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选择如何在世、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他也会在自己的研究中或者课堂上对相关文学作品之情节、人物形象及背后的逻辑等进行领导学意义上的解释和再发现。通过这样一些手段,他会引导学习者进行自我反思并借此而实现内在精神境界的超越,实现对于领导的正确理解。正如他在对《堂吉珂德》阐释时所力图实现的那样。因此,马奇对于文学的重视及其各种具体的文学诠释性工作从根本上说明他是一个诠释主义者(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排斥主流管理学)。而这样一个事实也说明,马奇的学术贡献不仅仅表现为他提出了各种有影响力的管理学理论,还在于他作为先驱者将诠释学引入管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中,由此开辟了一种新的管理学学术范式——诠释主义范式,提供了一种与主流管理学及其实证主义范式大不相同的思路。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式重视概念的定义和理论的构建,而诠释主义范式却重在通过阅读、诠释经典文学作品对人生意义、人性、世界本质,以及对什么是领导力等有所领悟。它所指向的并不是主流管理学意义上以概念、模型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知识,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智慧^③;主流管理学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距离及概念基础上的层层逻辑推理,而诠释主义范式则在此之外更加重视浸入文本情景,通过移情、理解、直觉等方式对文本背后精神世界进行整体的诠释和把握;主流管理学重视求得一种可明确表达的命题性知识,而诠释主义范式重视的人生智慧却难以用语言文字准确、充分地表达,是一种赖尔意义上的能力之知或者波兰尼意义上的缄默性知识;主流管理学追求一种科学化定位,而诠释主义范式却体现出明显的人文艺术性。两个范式的具体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马奇诠释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之区别

	诠释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
哲学基础	诠释学、存在主义等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
追求目的	体现为道德、人生境界的实践智慧	体现为规律或者理论的真理
思维方式	移情、理解、直觉	概念基础上的逻辑推理
学科特点或者定位	人文艺术性	科学性
研究对象	以经典作品为代表的各种文本符号	各种管理现象

- ① 马奇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开设了15年的“组织领导力”课程。他强调开设这门课程建立在三个信念之上。信念一:领导力的主要问题和人生的主要问题密不可分。信念二: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学习这些问题的最佳渠道。信念三:包括商学院在内的教育不应该只是为学生提供成功和快乐,而是应该回归教育的本来意义,即帮助人们考虑用多种方式理解人类存在的基本难题以及人类的本质。
- ② 在马奇看来,领导力有两个基本的维度:疏通水管和书写诗歌。前者指领导者有效运用已知技术的能力,后者则需要领导者是一个诗人,有一种诗人气质,即需要在行动中寻找意义,为生命涂抹颜色。
- ③ 伽达默尔认为对经典文本的诠释本质上指向一种人生的实践智慧。从马奇学术生涯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体现出很强的哲学性和智慧性,其对目的、意义等的追求,以及为生命涂抹颜色的热情也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可以概括的,更不是科学研究能够解决的。目的、意义等本质上就是一个实践智慧的范畴。

马奇代表的新范式虽然不同于主流管理学所推崇的实证主义范式,却有着自己的存在合理性,甚至有着相对于已有范式的优越性。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学作为一重要哲学流派,本身是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统治人文社会科学后体现出来的种种缺陷、不足而兴起的。它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知识之外重新定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目的及发现真理的方法等,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也从根本上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霸权式话语体系。迄今为止,实证主义哲学虽然在管理学、经济学等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在哲学领域却早已经是权威不再。而诠释学却因为自己的深刻性及实践相关性成为当代哲学领域十分重要的显学,体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在哲学上的成就及思考深度,影响力也早已扩展到文学、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文学化马奇及其独具特色的诠释主义范式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是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代表的诠释学一脉在管理学领域的延伸^①。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的深刻性保证了马奇诠释主义范式的合法性^②,保证了其远超出主流管理学及其实证主义范式的洞察力。实证主义范式及其主流管理学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具有评价、否定文学化马奇及其价值的资格与能力,因为其对知识理解的狭隘化决定了其在哲学意义上就已经是落后、二流的同义词了。

另外,相对于主流管理学及其实证主义范式,马奇的诠释主义范式也从一个更加根本的角度出发拓宽了人们对管理学科的认识并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管理学界普遍认为,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虽然存在,但是这种区别仅仅表现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已。虽然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管理学研究的是管理现象,但是它们都应该遵守共同的科学研究方法,都应该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种思路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值得商榷。因为它只考虑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没有认真考虑其中“人文”二字的含义。实际上管理学包含了“人文”与“科学”两种属性。相对于“科学”属性而言,其人文属性似乎还更加根本一些。忽视了人文属性,也就抹杀了管理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决定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学不应该只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有所差别,而应该在方法上也与之有所差别^[5]。即,管理学不应该仅仅突出自己的科学性,还应该突出自己的人文性。而人文性则意味着要“以文化人”,意味着重视语言文字和经典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要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来改造人,使其变化气质而成为大写的人。而马奇诠释主义范式正好体现了这样一种人文性。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学习、提升领导力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以文化人”、解决人对存在之关切进而提升人之道德境界的过程(经典文学作品本质上就有着“以文化人”的功能)。因此,马奇的新范式看似是其个人的一种文学爱好,实际上弥补了主流管理学及实证主义范式在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什么是管理学这样一些问题上的长期的片面性理解。

四、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价值

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相脱节、难以有效指导实践是主流管理学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 ① 马奇有没有阅读研究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及利科等的著作,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马奇在思想上与这些哲学大家一脉相承应该是确切无疑的。马奇是一个涉猎广泛的学者,不太可能接触不到对整个20世纪世界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的思想和作品。在自己的著作和访谈中,他曾经多次提及克尔凯廓尔。而后者正是现象学、诠释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倾向于认为马奇接触并认真阅读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的著作,受过其思想的影响。
- ② 马奇和德鲁克都是主流管理学的反叛者。但是,二者之间也存有明显的差异。德鲁克虽然在企业家群体中影响巨大,但是其代表的经验主义范式实际上缺乏必要的哲学理论作支撑。而马奇的新范式则有诠释学这样的重要哲学流派作支撑。

为解决这一问题,管理学界在实证主义范式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整,然而情况却未有明显的好转。那么,马奇代表的诠释主义范式能够促进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吗?这是可能的。原因在于,此种范式本质上意味着经由文学经典将管理学导向对人生本质的追问及个人在世的反思,意味着将本已完全科学化、实证化的管理学发展为一门实践化的管理哲学。如此一来,其所重视的也不再是对各种理论和概念的掌握,而是指向管理者的实践智慧。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解释学是对于我们实践的生活世界的反思,通过这种自我理解可以唤醒人的实践智慧”^[6]。

实践智慧也是伽达默尔后期诠释学的核心,他认为实践智慧及其相关的理解就是诠释学的德性。所谓实践智慧,是指与人的审慎明辨的行为有关的个体德性,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处事能力、技巧和方法^[7]。其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本质也是一种知识的类型。但不同于一般理论知识对于现象背后规律的解释,实践智慧的重心不在于给出事物“是什么”的解释,而是要探讨“应当如何”或“怎么做”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关切。杨国荣^[8]认为,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其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在他看来,以成己与成物(成就自我与成就世界)为指向,实践智慧联结了对世界的本质解释与对世界的变革,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这样一个内涵意味着马奇代表的诠释主义范式将能有效解决管理学多年来面临的学术与实践脱节之问题。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奇的诠释主义范式将会帮助主流管理学解决其难以解决的根本目的问题。作为管理者的具体行动,管理实践总是与人的目的和意识相联系^[9]。单纯意识和目的自然不是实践,但是,行动离开目的和意识的指导也谈不上是实践。实践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意义上的活动,在于它是在人的具体目的和意识指导下展开的。因此,管理学研究要想有效指导实践,首先必须帮助管理者确立正确的反映管理本质的根本目的。否则管理者就会茫然不知所终。而主流的管理学在这一点上却无能为力。因为科学化的定位以及实证主义范式的影响使得主流管理学重在研究各种实然性问题而非应然性问题。而管理的根本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应然性的问题,体现了组织的终极理想和追求。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主流管理学来说是不必考虑而且也解决不了的。由此也就导致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等在事实上成为管理的目的所在。而这样一些目的本质上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因为它只体现了管理的工具理性,却缺乏管理所必需的价值理性。员工和消费者等只是被看作达成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如此一来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对组织内弱势群体、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剥夺,同时也会因为过分索取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甚至管理者也会成为自身管理活动的牺牲品。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劳资冲突、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层出不穷,说明了这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管理实践看似理性,实则非常不理性。对于组织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主流管理学亟须对管理的根本目的作出说明和规定。但受限于自己的科学化定位,其对此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由此也就造成了管理者的各种困惑,扩大了学术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马奇的诠释主义范式却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等之所以被认为是经典,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优美的文字以及精巧的情节安排所体现出来的高度艺术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文字和情节背后隐含的深刻哲理性。通过描写某一大时代背景下的具体的人、种种波澜壮阔的情感冲突以及人生际遇,这些文学作品实际上体现了伟大作家们对人性、人生意义、世界本质乃至宇宙等方方面面的思考,也寄托了人类普遍的理想追求和情怀(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做到了“文以载道”)。例如,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虽然对主人公堂吉诃德各种脱离实际的想法和行为进行了嘲讽,但是对其改造世界的理想、

实际行为中表现出的高度道德自觉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经典文本的这样一个特点决定对其进行解释和理解的诠释学,实际上是一门经由文本理解而实现自我精神超越和人格塑造的学问^[10]。它和人类对幸福、智慧的追求密不可分。

马奇在课堂上诠释《堂吉珂德》《战争与和平》等经典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置身其中、不断受其思想启迪、不断自我反思、最终有所领悟的过程。虽然这样一个过程表面上看是平静无形的,但是平静和无形之下却是波澜壮阔的思想斗争与脱胎换骨式的精神转变。当然一次两次这样的思想斗争不会使管理者有质的精神变化,然而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很可能意味着管理者对人生价值以及生存意义等重大问题的豁然开朗,开始进入一种澄明之境。于是人开始跳出私心小我之限制,将服务于社会与他人、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当成自己的根本目的。对于管理者和组织来说,这样一个目的看似因为忽略自身利益而缺乏理性,实际上却是充满智慧的。它为组织内一切制度和规范定下了基调,从根本上解决了组织的合法性以及组织内外人心的凝聚等问题,意味着组织的内外、上下平衡与长治久安。同时这样一个目的实际上也意味着管理者自身的解脱与幸福。因为其真正放下了小我的牵绊。而小我则是人在世一切烦恼挥之不去的总根源。也就是说,树立了这样一个目的实际意味着管理者真正的解脱与幸福。因此,文学化马奇及其诠释主义范式看似无用,实则却是一种大用。实际上马奇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当他强调领导力的主要问题与人生的主要问题密不可分,强调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学习这些问题的最佳渠道时,就说明他已经认识到经典文学作品与人生目的、管理目的等的紧密相关性。

第二,马奇诠释主义范式能够提升领导者的道德判断力,帮其解决现实中无处不在的价值与是非判断问题。管理实践本质上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因而无时无刻不与各种各样的价值及是非判断联系在一起。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管理的核心要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决策和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一旦管理者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意味着自身决策正当性的丧失,意味着相关利益主体发自内心的反对与不合作,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或者负面影响。而现实也是管理者们经常在这类问题上犯下错误。例如,有些企业家不但强迫员工疯狂加班,甚至还喊出了“996”是一种“福报”这样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口号。此种状况的存在需要主流管理学有所作为。然而主流管理学对此也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主要原因仍旧在于其将自身定位为一门科学,重在发现管理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知识,即重在解决各种实然性的问题。而价值和是非判断则是一些应然性的问题,而且往往和具体情境纠缠在一起,其解决本质上依赖管理者内在的道德判断能力,不是规律性的知识或者概念理论能够解决的。因此,主流管理学及实证主义范式在这些问题上是与管理实践相脱节的。

马奇的诠释主义范式则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经典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准确的价值判断。伟大的作家也总是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无情地批判各种违背人心的假、恶、丑,颂扬符合人心的真、善、美。因此,对伟大文学作品多加阅读、潜心玩味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生命的体验和道德的教化。这种教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一种人生的澄明之境,意味着学习者是非判断能力的大幅提升。如此一来,管理者在处理各种价值和是非判断问题时就能跳出私心的控制,自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相关决策就更容易为相关利益主体所认可和接受,从而也就在根本上解决了决策的正当性问题。马奇对于这一点也早有认识。他重视堂吉珂德这一文学形象的领导学价值,主要原因是后者跳出了小我的限制,更多的是从自己作为一个骑士的角色伦理出发考虑问题。这在常人看来荒唐可笑,对于管理和领导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代表了领导者最需要的道德判断能力,从本质上解决了管理决策和领导亟待解决的正当性问题。

第三,马奇诠释主义范式有助于管理者把握合适的“度”,创造性地解决各种具体应该“怎么

做”的问题。价值和是非判断与“应该做什么”联系在一起。而现实的管理实践在“应该做什么”之外，还面临着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怎么做”意味着管理者需要从自身面临的具体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设计出能够完成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其本质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主流管理学受实证主义的影响，重在概念、理论的构建，以为掌握了相关规律，自然就会有效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实际上，概念和理论虽然有助于管理者理解管理世界中的一些现象，但是对于有效手段和路径的设计则是意义有限的。因为理论总是追求普遍性的，而实践却总是具体且各不相同的。具体“怎么做”离不开理论，更依赖于管理者对具体情境的认知和理解，依赖于其将理论与具体情境灵活结合的能力。其本质则意味着一种“度”的把握。而这种对“度”把握则需要实践智慧，需要管理者有极好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唯有如此，管理者才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做到全面思考，不走极端，从而实现“度”的合理把握。而主流管理学重在理论知识，不重视实践智慧和形上思考，由此也就将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排斥于管理学大门之外。如此一来，其看似很有用，实则无助于管理者对“度”的合理把握。因为具体的理论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自身的灵活应用问题。如此一来必然会加重学术与实践的脱节。

马奇诠释主义范式则在根本上有助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阅读、诠释经典文学作品虽然不像阅读教科书和文献那样有助于读者掌握各种管理概念和理论，却能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将其带入一个纷繁复杂、有着各种剧烈冲突的艺术世界中。这有利于管理者体验理解人生意义、人性、世界本质和历史等所内含的复杂性、戏剧性、普遍联系性等。因为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本质上就是因为其情节和人物虽是艺术虚构，但却深刻地刻画出社会、人生、人性等真相，呈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世事的变化无常。如此一来，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诠释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精神享受，也不仅仅有助于人们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还会从根本上帮助他们养成一种与现实社会、人性相适应的以整体性、辩证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管理者从多方面思考以及辩证看待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由此必然会从实际出发，在灵活运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设计出相关的行动方案，最终有助于实现对“度”的合理把握。

实际上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特点，马奇也已经有所论述。在探析叶芝《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歌时，他强调诗歌是表达审视怀疑、悖论和矛盾的天然媒介，有利于维持人们对于复杂性的认识。也正是对诗歌以及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视，马奇的管理思想中总是充满了一种主流管理学不具备的整体性、辩证性。例如，在组织学习的研究中，他一方面强调探索式学习，另一方面也强调利用和开发式学习；他重视其他学者同样重视的理性，却又在这之外强调“愚蠢”的有用性。对这些悖论的统一反映了他管理思维的整体性和辩证性，也体现了他不同于其他管理学者的深刻性。

第四，马奇诠释主义范式有助于提升管理者的行动意志，解决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行分离”问题。“知行分离”是现实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一类问题。很多情况下管理者不乏好的思想，但却难以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例如，很多人都知道公平的内涵及其重要性，但是却很难做到公正地对待他人。如此一来，“知”不能转化为“行”，从而也就成为一场空谈。而管理者之所以“知行分离”，本质上根源于自身道德修养不够及其导致的意志薄弱。道德修养的欠缺会使具体情境下的管理者受到内在欲望、名利的驱使与控制，由此导致了行动意愿的不足，导致知与行的分离。现实中的很多管理者确实深受此问题的困扰。这类问题的广泛存在说明学术需要对管理者有所指导和帮助。否则，学术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然而主流管理学在这一问题上也是无能为力的。受实证主义范式的影响，主流管理学重在发现、建构各种概念和理论，并不重视管理者道德、行动意志的价值。道德、意志等作为一种非理

性因素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属于其所关注的范畴。因此,主流管理学在理论上就无法解决“知行分离”的问题。而马奇的诠释主义范式却能弥补主流管理学的不足,促进管理者行动意志的生成及各种“知行分离”问题的解决。

前面提及,经典文学作品背后都隐含了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对人生意义、人性、世界本质及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因此,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和诠释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思考、反思自己如何在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经典文学内涵的视域与个人视域不断相融合、新视域不断形成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有助于管理者在整体意义上对宇宙及人生本质的把握。这种把握不仅体现在知识上,更关键的是会影响到管理者的价值观,促进其对外在名利的正解。管理者会认识到自己一些执着于名利想法的荒谬和虚无。如此一来,欲望和名利也就难以对其行动形成大的干扰。管理者自然就会坚定地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正如堂吉诃德不顾利害、执着履行自己作为骑士的职责那样。也就是说,管理者会通过阅读经典而培养自己承担责任、践行道德的勇气和意志。

五、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讨论了马奇诠释主义范式的实践价值,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说明马奇诠释主义范式的重要性、学术贡献以及传承此范式的现实必要性。当然,马奇生前对于学术的有用性似乎不甚关注。他不但刻意躲避各种世俗的诱惑,而且公然质疑商学院培养所谓咨询师的价值何在。他还不断呼吁,应该把学术研究和教育从那些注重功利和眼前利益的行政官员手中解放出来,交给那些以学术为业的学者。由此观之,似乎马奇为学术而学术,并不特别关注学术的现实有用性。

讨论文学化马奇及其诠释主义范式的实践价值似乎有违马奇本人的意愿。这实际上并不代表马奇不关注学术的价值。马奇反对的是单纯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主导下的那种实用性,反对的是单纯地将学术作为追求利润的工具。在他看来,此种有用性看似有用,实则非常愚蠢。它不但有害于整个社会,也会毁了学术自身。而对于真正的价值和有用性,马奇实际上并不回避和反对。这一点只要通读其相关著作就不难以理解。马奇追求的乃是一种能够反映管理本质、能够从根本上有助于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以及个人的真正自由的学术。而这也正反映了马奇相对于主流管理学者的深刻。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和理解从来就不止步于对真理的认识,其本质还是和现实的应用联系在一起的。伽达默尔认为,离开现实的应用,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诠释。诠释学本质上就是诠释、理解和应用的统一体。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文学化马奇实际上是与现实应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马奇诠释主义范式背后的管理学逻辑凸显了文学化马奇的后现代色彩。后现代管理学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主流管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1],强调在知识、逻辑等传统理性因素之外,管理学还应该重视道德、情感、理想和意志等被传统管理学忽略的非理性因素的价值^[12]。马奇生前并没有像彼得斯那样被划入到后现代管理学的阵营。但是,他对文学的重视,对道德、情感及行动意志等的强调,说明其有着非常明显的后现代倾向,将其划入后现代管理学的阵营未尝不可。而且德鲁克、彼得斯等更多的贡献是强调了道德、情感、理想和意志等的价值,没有就如何培养管理者的道德、情感、理想和意志等展开深入的思考,也没有发展出一套针对这些内容的教学和科研模式。马奇及其诠释主义范式却在此方面有着较多的思考和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马奇实际上将后现代管理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哲学基础。

六、结 语

本文主要从诠释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文学化马奇所具有的管理学意义。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看到马奇将经典文学作品引入管理学教学和研究中绝非一种荒谬,而是一种有着深刻哲学思考的范式创新。它实际上继承了狄尔泰以来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诠释学传统,是诠释学一脉在管理学中的延伸,也代表了马奇对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其重要性远远超出马奇所建立的各种管理学理论)。而诠释学具有的实践智慧属性也进一步保证了马奇的诠释主义范式能够有效弥补主流管理学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学界应该重视并认真研究文学化马奇的价值和意义。诠释主义范式也应该成为管理学未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或者范式基础。对于这一点,国内管理学近来已经有所认识和理解。例如,李培挺^[13]认为“管理诠释学之于管理理论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层面,更是本体论层面,甚至是管理理论知识生产层面的定位”。

对于本土管理学来说,文学化马奇也是意义重大。就当下现实的管理实践来说,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无疑是广大领导者道德境界的缺失。这种缺失也是导致包括官僚主义、干群关系疏远等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本土管理学受西方管理学的影响太深,将自身定位成一门科学,忽视了对于道德修身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从而也就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文学化马奇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思路,即对文学经典的深度学习和诠释是一个值得一试的选择。而这也为我们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秉持了一个诠释学的传统,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诠释来提升士君子的道德境界。例如,《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因为做到了“文以载道”,所以一直是儒家用来培养道德君子的一个重要凭借。领导干部多学习这样的经典可以“感悟道情,吟咏情性”(王夫之语),即《诗经》可以通过形成人的道德情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其道德境界。这说明,在高度重视广大领导干部道德思想建设的今天,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管理学思维仍旧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弥补传统马列主义在道德哲学阐述上的不足,引导广大领导干部“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体悟到道德本质上乃是自己的“天命”与本性之所在,意味着一种人生的不得不如此。

参考文献:

- [1] 洪汉鼎. 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5.
- [2] 詹姆斯·马奇. 马奇论管理:真理、美、正义和学问[M]. 丁丹,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07.
- [3] 刘澜. 诗、领导力与马奇[J]. 清华管理评论,2016(5):76-79.
- [4] 保罗·利科.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M]. 孔明安,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
- [5] 胡伟希. 中国古代哲学散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73.
- [6] 邵华. 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J]. 现代哲学,2010(5):28-34.
- [7] 黄志军. 走向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辩证法[J]. 学术研究,2015(10):9-13.
- [8] 杨国荣. 论实践智慧[J]. 中国社会科学,2012(4):4-22.
- [9] 杨国荣.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
- [10] 潘德荣. 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J]. 中国社会科学,2014(7):50-66.
- [11] 胡国栋,王天娇.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19(4):21-29.
- [12] 胡国栋,刘顺伟. 儒家絜矩之道与组织的德性领导[J]. 财经问题研究,2017(11):3-11.
- [13] 李培挺. 转型境遇下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哲学研究[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9:12.

The Management Value of Literary March: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GONG Jian-gang¹, XIA Fei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 China;

2. CIECC Overseas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100048, China)

Summary: Teaching leadership courses through classic literary works is a major feature of James March.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 introduc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such as War and Peace and Don Quixote into the classrooms of business schools, becoming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eaching leadership courses. This literary March is a significant legacy left by March to modern management studies. For such a legac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eems to have not given enough attention. Apart from March himself, few scholars dare to combine literary classics with management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mote March's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M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literary March does not meet the standards of mainstream management and positivist paradigms, it is in line with the ideological spirit advocated by hermeneutic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chool, and can be said to be an extension of the hermeneutic lineage in modern managem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extension fundamentally ensures the academic depth of literary March,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opens up a new academic paradigm in management: an interpretive paradigm, providing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cademic approach from mainstream management and its positivist paradigms.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mainstream management research paradigm emphasizes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while the interpretive paradigm focuses on interpreting classic literary works to gain insights into life, the world, and what leadership is and it does not refer to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ainstream management that mainly focuses on concepts and models, but rather a practical wisdom.

Mainstream management emphasizes the distance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subjects, as well as logical reasoning based on concepts, while the interpretive paradigm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immersing oneself in textual situations, interpreting and grasping the spiritual world behind the text as a whole through empathy, understanding, intuition, and other means. Mainstream management emphasizes seeking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that can be clearly expressed, while the interpretive paradigm values life wisdom that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and fully express in language and writing. The mainstream management studies pursue a scientific positioning, while the interpretive paradigm reflects a clear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nature.

Moreover, compared to mainstream management paradigms, the interpretive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literary March can better address some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practice. Specifically,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people's spiritual realm and moral judgment abilities but als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al world, thereby helping to resolve such issues closely related to practice as fundamental goals, moral judgment, a fine line,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to solve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mainstream management.

Key words: March; management; literature; hermeneutics; practical wisdom

(责任编辑:孟 耀)